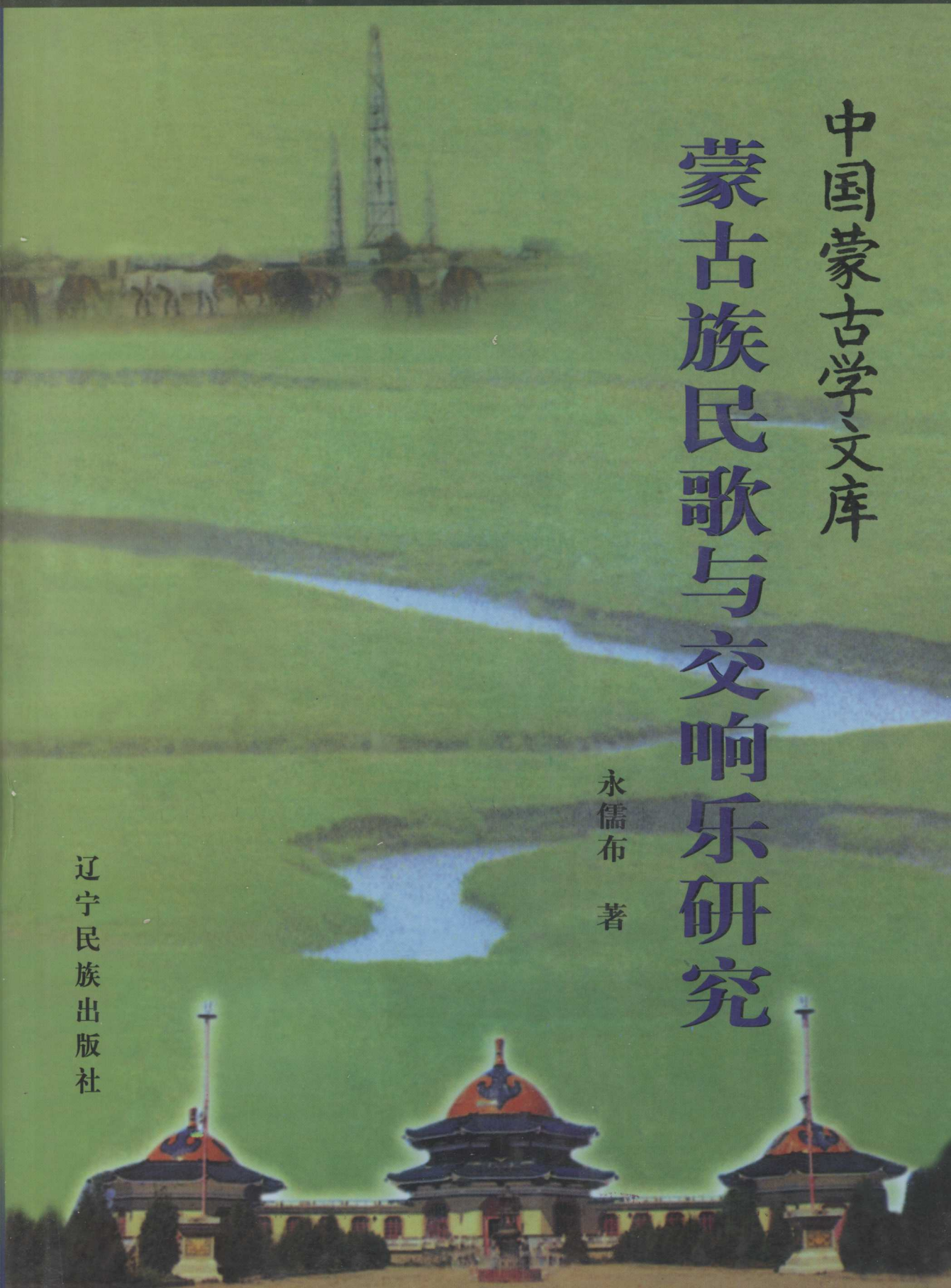


中国蒙古学文库

蒙古族民歌与交响乐研究

永儒布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中国蒙古学文库

蒙古族民歌与交响乐研究

永儒布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古族民歌与交响乐研究/永儒布著.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9.10

(中国蒙古学文库)

ISBN 7-80644-303-7

I. 蒙… II. 永… III. ①蒙古族-民歌-研究-中国
②蒙古族-交响乐-研究-中国 IV .J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61029号

出版发行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

幅面尺寸: 185mm×260mm

印 张: 23 $\frac{3}{4}$

字 数: 80千字

印 数: 1001—1500

出版时间: 1999年10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5年6月第2次印刷

责任编辑: 朱 虹

封面设计: 杜 江

责任校对: 陈文本

定 价: 48.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344

E-mail: lnmz@mail.lnpgc.com.cn

《中国蒙古学文库》序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在自治区成立50周年之际,《中国蒙古学文库》开始出版了。这套文库的出版,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

蒙古族是我们祖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她在中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发展中作出过卓越的贡献,也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我国是蒙古族的发祥地,有关蒙古族的史料记载最早见于唐朝,随之历代都有丰富的史料。蒙古族统治者建立了元朝,其历史功绩震惊中外,不仅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也为中国版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直至近代以来,蒙古族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发展祖国的历史文化而共同奋斗。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推翻“三座大山”的伟大斗争中,于1947年5月1日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新中国成立后,相继又在蒙古族聚居的地区建立了自治州、自治县和民族乡,蒙古族人民当家做了主人,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

蒙古学是研究蒙古族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13世纪蒙古族的振兴,使当时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学者、传教士、商人与使臣记载了有关蒙古族的历史文化,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自18世纪后半叶开始,欧洲的德、法、俄、英及亚洲的日本等国家,对蒙古族的历史、语言、文学及风俗习惯进行了研究。1921年蒙古国独立后,成为研究蒙古学的主要国家,引起了国际蒙古学界的注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蒙古学发展为国际性的一门科学,建立了国际蒙古学学者协会,参加协会的会员来自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召开了六次国际蒙古学学术讨论会。

我国将蒙古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展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仅1985年以来,在呼和浩特市召开了五次内蒙古全区蒙古学研究信息交流会;1987年以来,内蒙古大学与内蒙古师范大学先后召开了三次国际蒙古学学术讨论会,同国外学术交流和互访增多。近十年来,在深入研究原有的一些传统学科的同时,扩大了研究领域,并已在蒙古族哲学、军事、经济、法学、教育学、宗教学、民俗学、天文学、蒙医学、兽医学、建筑学、科技史等多学科领域开展了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至今,我国蒙古学已发展成为综合性学科。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与部分高等院校成立了蒙古族历史、语言、文学、哲学研究所,内蒙古大学成立了蒙古学研究院,内蒙古大学与内蒙古师范大学已经招收蒙古族历史、语言、文学、哲学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大学及其他兄弟省区社会科学院、民族院校中也有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对蒙古学进行研究。蒙古学研究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全国性的有蒙古族历史、语文、文学三个学会。内蒙古自治区有六个蒙古学的研究会,有一大批老中青兼专职的学者、干部参与蒙古学各学科的研究。

为适应蒙古学研究发展的新形势,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经济史研究会从1987年开始准备编写《中国蒙古学系列丛书》(即现在的《中国蒙古学文库》)。经过各方面近十年的努力,于1996年组织了领导小组及编委会,确定了撰稿人员。这项工作得到了国家民委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重视和领导,得到了辽宁民族出版社及与我区有蒙古语文协作关系的兄弟省区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因而加快了工作步伐。

编写与出版《中国蒙古学文库》,是为了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丰富民族文化宝库,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素质,繁荣祖国的科学事业,促进国内外文化交流和蒙古学研究的深入发

展，推动蒙古族同祖国各兄弟民族一起繁荣发展，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此，我们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把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总的指导思想和总的要求，贯彻于编写与出版“文库”工作的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蒙古族历史的实际出发，以充分的可靠的史料为依据，认真地进行科学分析，探索各门学科的客观规律。同时，吸收国内外科研成果的精华，真正撰写出比较全面系统的科学的学术著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及其取得的伟大成就，维护祖国的统一，增强各民族的团结，更好地鼓舞和激励人民，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当前，我们正处于跨世纪发展时期，即将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科学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对我国蒙古学应在蒙古族历史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特点、规律以及面临的新课题等方面多作积极的探索和深层次的研究，帮助人们了解蒙古族的过去，正确认识今天，走向明天。我们编写与出版《中国蒙古学文库》要反映蒙古学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力争做到对蒙古族历史文化的正确积累，而且将这门科学向前推进，使其在21世纪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达到更高水平。《中国蒙古学文库》将以蒙汉两种文字陆续出版。在编写过程中，由于我们的理论基础、学术水平和搜集资料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和局限性，书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疏漏和不当之处，恳请读者能及时赐正。

最后，愿《中国蒙古学文库》，能给予人们以知识上的启迪、精神上的鼓舞，使其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蒙古学文库》领导小组

1997年5月5日

《中国蒙古学文库》总论

蒙古族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传说蒙古人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据文字记载，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在漫长的岁月中，蒙古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在历史上曾经建立过横跨欧、亚两洲的蒙古大帝国；建立过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元朝。蒙古民族对中国历史及世界历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巨大的。

蒙古族的族源问题，多年来学术界争论不休，截至目前，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现在多数学者认为，蒙古出自东胡。东胡，是包括同一族源、操有不同方言、各有名号的大小部落的总称。他们“在匈奴东，故曰东胡”（《史记·匈奴列传》卷110），居住潢水（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西刺木伦河）、大凌河、老哈河等诸河流域。公元前209年，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所破，东胡各部受匈奴人统治达三个世纪之久。公元1世纪末2世纪初，汉朝击破匈奴，北单于出走，东胡人的一支鲜卑人自潢水流域转徙其地。匈奴余者十余万落，皆自称鲜卑。鲜卑至此便强盛起来。到公元2世纪中叶，檀石槐统治时期，“尽据匈奴故地”（《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引王沈）。4世纪中叶，居住在潢水、老哈河流域一带的鲜卑人的一支，自号“契丹”，居于兴安岭以西（今呼伦贝尔地区）的鲜卑人的一支则称“室韦”。蒙古，是室韦人的一支，始见于《旧唐书》，称作“蒙兀室韦”，《新唐书》称作“蒙瓦”。“蒙兀”、“蒙瓦”，是“蒙古”的同名异译，是室韦五部落之一大室韦部的一个成员。

蒙古部最初只是包括捏古斯和乞颜两个氏族的小部落，他们被其他突厥部落打败后只剩下两男两女。这两家人为了逃避敌人，逃到一处人迹罕至的额儿古纳昆的地方生息繁衍。大约经过400年时间，部落才兴盛起来，从原氏族中分出若干分支，各分支均有各自的名称，并单独成为一个斡巴黑（氏族）。公元8世纪后半叶，当他们走出额儿古纳昆的时候，已经分出70个分支（灶）斡巴黑。这70个斡巴黑被称为“迭儿勒勤蒙古”，迭儿勒勤蒙古到10—12世纪时，有兀良哈、弘吉利、斡罗纳兀惕、速勤都思、巴牙兀惕等18个部落。根据拉施特《史集》记载，从额儿古纳昆迁出的蒙古人中，有一位很有威望的人，名叫孛儿帖赤那。以孛儿帖赤那为首领的迭儿勒勤蒙古自称“乞牙惕氏”（乞颜的复数）。他们从额儿古纳昆迁到斡难河源头肯特山一带居住，由狩猎业逐步过渡到游牧业。据《蒙古秘史》记载，孛儿帖赤那的第十二世孙朵奔篾儿干死后，其妻阿兰豁阿又生了三个儿子，蒙古人传说，他们是感光而生的“天子”。他们是从阿兰豁阿洁白的腰里出生的。所以他们的后裔被称为“尼伦蒙古”。尼伦蒙古中，以孛端察儿为始祖的孛儿只斤氏最为著名。孛儿只斤氏族又繁衍为19个氏族。迭儿勒勤蒙古和尼伦蒙古，是蒙古部的正统后裔，他们被称作“也克蒙古”（大蒙古）或“原蒙古人”。除也克蒙古外，还有札剌亦儿、塔塔儿、蔑儿乞惕、斡亦剌惕、巴儿忽惕等蒙古语系部落。自9世纪以后直到13世纪初，活跃在蒙古地方的还有操蒙古语的克烈亦惕、乃蛮、汪古等突厥语系部落。

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前蒙古诸部落各有各的名称和活动地域。他们的社会发展不平衡。有的部落已经进入阶级社会门槛，有的则处在氏族社会发展阶段；各部的经济生活也不相同，有的从事游牧业，有的从事狩猎业，有的则从事农业。各部之间的语言也有差异，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建国后，还有九种不同方言；宗教信仰也互有区别，有的信仰也里克温教，有的则信仰孛额教（萨满教）；有的部落已经开始使用文字，有的则刻木为记号。自12世纪开始，在蒙古高原形成几大部落，为了争夺统治全蒙古的权力，他们之间发生了无休止的战争。蒙古地区形成了“天下扰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蒙古秘史》254节）的混乱局势。1205年，帖木真统一蒙古“毡帐百姓”，占领东起兴安岭、西迄阿尔泰山、南达阴山的广大地区，结束了蒙古的混乱局面。1206年春，在斡难河源举行“忽里勒台”，推举帖木真为大汗，号成吉思汗，国号曰

“大蒙古国”。成吉思汗以也克蒙古为核心，将族属不同、社会发展不平衡、方言各异的各部统一在一个汗权统治下，形成了具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言和共同心理素质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族。从此，“蒙古”由部落名称变成了民族的名称。“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宗族的兴盛，由于他们是蒙古人，于是各有某种名字和专称的（各种）突厥部落，如札剌亦儿、塔塔儿、斡亦剌惕、汪古惕、克列亦惕、乃蛮、唐兀惕等都自称蒙古人”（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1分册，汉译本166页）。

成吉思汗称自己为全人类的汗，蒙古国是创建中的世界帝国。为此，蒙古国家建立后，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窝阔台、贵由、蒙哥诸汗利用半个世纪的时间，灭了金、西夏、花剌子模、黑衣大食（阿拉伯）、赛尔柱土耳其、南高加索诸国，征服了罗斯，建立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大帝国。成吉思汗把用武力征服的地区分封给他的四个儿子，称“忽必”（份子），诸子的“忽必”是蒙古帝国的组成部分。126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继承蒙古汗位，1264年迁都中都，1271年建立元朝，1279年灭南宋。13世纪60年代以后，蒙古帝国分裂为金帐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哈台汗国、伊儿汗国等四大汗国。忽必烈和他以后的元朝皇帝，在名义上仍是蒙古大汗的继承者，但各汗国宗王推戴的君主有权处理本国的大事。

元朝的建立标志着蒙古社会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忽必烈为了适应汉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逐渐采用汉法，同时把蒙古原有的统治法纳入到元朝的国家制度，进行蒙古汗的封建专制统治。元朝统治者执行民族不平等政策，把它统治的人民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包括契丹和女真）、南人（宋朝统治下的江南人民）等四个等级。蒙古人在法律和政治上享有特殊地位。元朝统治者为了防止汉化，保持蒙古的传统文化和习俗，严禁迁居内地的蒙古人改用汉俗，把蒙古语当作“国语”。在岭北行省执行蒙古原有的制度，限制移民，实行屯田。由于元朝统治者执行保护民族文化、经济的政策，使蒙古族的经济、文化生活得以保存和发展，这是蒙古民族与入居中原建立政权的其他北方民族所不同之处。

从14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元朝以外的四大汗国的蒙古人，受被征服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影响，被当地突厥人和伊朗人所同化，只是蒙古统治者掌握着当地的政治、军事权力。14世纪50年代开始，四大汗国先后被当地人民所推翻。1386年，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以妥欢帖木尔为首的蒙古统治者退居蒙古地区。13世纪初开始活跃在世界历史舞台的蒙古人，到14世纪末，元朝统治者退居蒙古地区，使蒙古地区重新成为他们的活动中心。

蒙古统治者退出中原后，为了恢复元朝统治，与明朝进行了十余年的战争。明朝洪武、永乐皇帝多次进军蒙古地区，但仍未达到消灭北元势力的目的。蒙古统治者在与明朝的战争中失利，这样，明朝与蒙古以长城为界各自为政，形成南北对峙260余年的局面，到17世纪40年代才告结束。

自蒙古皇室退居蒙古地区以后，15世纪中叶开始蒙古汗权旁落，封建领主各自为政，形成封建割据局面。蒙古大汗成为领主们争权夺利的工具，封建领主们按照自己的利害关系废立大汗或以丞相的名义掌握实权，围绕汗权问题，蒙古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斗争，甚至引起内讧，这一局面一直到巴图孟克达延汗（1460—1504）时期。达延汗用武力镇压各封建领主的反叛，剥夺异姓贵族的政治权力，把蒙古六万户（兀鲁思）分封给诸子，形成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一统天下的政治制度。达延汗消除封建割据，重新统一蒙古，被称为“蒙古中兴英主”。

达延汗死后又导致黄金家族内部的矛盾。随着封建制的发展，达延汗分封的各万户的汗，各自为政，不受大汗的统治，把蒙古大汗只称“察哈尔汗”；到林丹汗（1592—1634）统治时期，在漠南蒙古已经形成了16个兀鲁思（封建领地）。

正当蒙古封建割据加剧之际，1616年女真族努尔哈齐建立后金王朝。后金的建立对蒙古的政治局势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改变了二百多年来的明朝与北元的对峙局面，蒙古大汗林丹汗与明

朝签订了共同反对后金的协议。其次，改变了蒙古内部的关系，努尔哈赤和他的继承人皇太极采用联姻、封爵等手段拉拢邻近的蒙古部首领，从而在蒙古内部发生了与后金和与战的斗争。努尔哈赤最初的战略目标是消灭明朝，但1619年的抚顺战役中扎鲁特部受林丹汗旨令出兵一万援助明朝打后金，从此以后努尔哈赤把攻击目标转向蒙古，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利用蒙古内部的矛盾，联合科尔沁等部攻击林丹汗。林丹汗在与后金的战斗中失利，于1634年率部奔青海，在青海西拉塔拉病故。1636年内蒙古四十九旗王公聚会多伦诺尔，承认皇太极为蒙古汗。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四百余年的统治到此结束。

清朝征服整个蒙古用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历经六个皇帝。后金征服内蒙古后，喀尔喀和额鲁特蒙古为了共同抵抗清朝的征服，于1640年制定了《蒙古·卫拉特法典》，喀尔喀蒙古与额鲁特蒙古虽然制定了共同抵抗清朝的协议，但没有统一领导喀尔喀与额鲁特的领袖人物，喀尔喀的札撒克图汗部、图希业图汗部、车臣汗部不团结，相互互动干戈；额鲁特的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准格尔部各有其汗。1678年噶尔丹统一额鲁特四部，建立了准格尔汗国。噶尔丹为了把喀尔喀蒙古也纳入准格尔汗国的统治之下，于1688年进兵喀尔喀，以图希业图汗部首领察浑道尔吉为首的喀尔喀封建主逃入漠南，康熙皇帝把他们安置在苏尼特部地，噶尔丹追击察浑道尔吉等人，率兵进入漠南。从此开始了准格尔汗国与清朝之间长达近百年的战争，18世纪80年代才告结束。

在清朝统一全国的事业中，蒙古族作出了巨大贡献。清朝完成统一大业后，一方面依靠蒙古族巩固其统治。出身科尔沁的孝庄文皇后、科尔沁左翼后旗扎萨克郡王、御前大臣僧格林沁及八旗蒙古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于谦等人对巩固和捍卫清朝统治，功绩卓著。另一方面又怕蒙古强大，造成对清朝统治的威胁。所以，清朝征服蒙古后，实行盟旗制度，进行分而治之的统治；提倡喇嘛教，推行愚民政策；采用封官晋爵、联姻等手段拉拢蒙古王公；执行封禁政策，严禁蒙古人与汉人的接触。所以，清朝前期蒙古族处于互不来往并与外界隔绝的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

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在蒙古地区销售商品、掠夺资源的权力。随着外国商品的进入，蒙古王公贵族的生活品的需求增加，开支愈来愈大。为了满足日益增多的金钱需求，招农出租旗地，收取租金；鸦片战争以后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化，1850—1864年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给予清朝统治以严重打击。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安置无路可走的饥饿逃荒的农民，放弃了禁止汉族农民迁居蒙古地区的禁令，对大批流入蒙古地区的汉族农民表示默认。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蒙古王公贵族逐渐削弱，形成“蒙王不足倚，蒙兵不足恃”的局面。而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势力，成了清朝维持其统治的主要依靠力量。满蒙贵族的联合统治，逐渐被满汉官僚的联合统治所代替。清朝统治集团内民族成分的这种变化，导致了清朝对蒙政策的改变——解除“蒙禁”政策，移民开垦；改变蒙古王公统治的自治体制，以州、县代替。1901年在全国推行新政，在蒙古地区（主要是内蒙古）的具体措施是实行“移民实边”政策。清政府出面招徕内地农民开垦蒙地，强迫蒙古王公报垦，从而使大片的肥沃牧场变成农田。蒙古牧民无奈，有的弃牧务农，有的则迁居荒无人烟的沙漠地区。汉族聚居区设州县，蒙古王公不仅无权管辖州县，反而把蒙旗自办的“新政”也交给州县官监督，原来蒙旗自身审理的案件，州县有权复审。这样，蒙古王公的原有自主权益受到损害。因此，清朝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后，原来清朝政府主要代表满、蒙贵族阶级的利益，演变为“更多地代表汉族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公开而明显地民族歧视、压迫和掠夺”（郝维民主编：《内蒙古近代简史》第30页），对蒙古进行大汉族主义统治。因此，清末保护牧场，保护蒙古原有之自主权益，便成为蒙古各阶层的共同要求。辛亥革命爆发后，蒙古地区发生的“独立”“自治”运动的主要原因就在此。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曾指出：“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

以外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北洋政府为了分割统治蒙古，把呼伦贝尔、哲里木盟分别划归黑龙江省、吉林省和辽宁省管辖，还按清朝将军、都统管辖范围，在内蒙古设置热、察、绥三特别区，将昭乌达、卓索图、察哈尔八旗、锡林郭勒盟、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归化城土默特二特别旗，均划归三特别区管辖。三特别区都设最高长官都统，1928年，国民党政府把三特别区改为行省。把阿拉善、额济纳划归宁夏省，使蒙古完全失掉自主权益。尤其是国民党在“国族主义”“中华国族”口号下，不承认中国少数民族的存在。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把中国各少数民族称作汉族的大小宗支。

进入20世纪以后，蒙古民族受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汉族主义统治的同时又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统治，处于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蒙古族有识之士为了求得民族的生存，获取民族的自由和解放，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以不同的斗争手段，进行民族解放运动。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民族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蒙古民族的解放，1925年秋天，中共中央在《蒙古问题决议案》中指出：“我们的党应当使蒙古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全中国的解放运动结合起来。”“我们认为应当组织内蒙古国民革命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这是蒙古人民的民族上政治上的任职”（摘自郝维民主编《内蒙古近代简史》）。党的六大“决议”上提出：“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中重申无条件地承认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极大地鼓舞了蒙古人民的反帝反封建反大汉族主义的斗志。1925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共产国际领导下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反民族压迫，实现内蒙古自决自治等民族民主革命纲领，组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军。1926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席尼喇嘛，组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第十二团，武力推翻乌审旗王公政权，建立了人民政权公会；次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小三爷，组织革命武装，推翻了阿拉善旗王公政权，建立了革命政权阿拉善旗政务委员会。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内部发生分裂，白云梯等叛变革命，投靠了蒋介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转入地下，一部分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蒙古族人民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历史上形成的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把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乌兰夫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1947年5月，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境内的蒙古族聚居区也先后成立了自治州、自治县、民族乡，按照宪法赋予的权力，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

元朝以前蒙古诸部，分为草原游牧部落和森林狩猎部落，前者称为“毡帐百姓”，后者称为“林木中百姓”。东起呼伦贝尔，西至阿尔泰山，南居阴山的宽阔草原为游牧部落的活动地区；东起贝加尔湖，西至额尔齐斯河的森林地带，是林木中百姓的活动地区。自元朝以后，森林狩猎部落逐渐向游牧业过渡，游牧业成为整个蒙古民族的主要经济，狩猎业成为蒙古人补充生活来源的副业或大规模军事训练的围猎活动。

蒙古牧民有经营游牧业的丰富经验。他们不仅注重牲畜的数量，而且还特别注重质量。他们选择公种畜和保留母畜都很注重质量。所以，蒙古的畜种都是由良畜组成的。

蒙古人有很高的经营畜牧业的技术，有很好的管理方法。宋朝使节徐霆赞扬蒙古人的养马法，说蒙古马骑至数百里无汗，此养马之良法，南人所没有（《黑鞑事略》）。1296年，元朝曾向高丽派遣牧业技术人员，指导那里的养畜业。

根据史籍记载，12世纪时蒙古诸部中就有从事农业的部落，如色楞格河流域的蔑儿乞部。13世纪到过蒙古人居住地方的旅行家们也曾记载蒙古地区的农业状况。但是，农业在蒙古人的经济中没有占据主要地位。自16世纪下半叶开始，在蒙古地区出现了定居的农业村落板升。但是，

种田的多为出关口的汉族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蒙古人甚少。自实行“移民实边”政策以后，内蒙古地区的大片土地被开垦，牧场日益缩小，使部分蒙古人弃牧务农，出现了蒙古族农民和蒙古族聚居村落。蒙古人学习和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农业人口占蒙古族人口的多数。但是，蒙古族的农业尚未得到充分发展，长期处在粗耕的落后状态。

在古代，蒙古有较发达的工业。据史籍记载，蒙古地方多铜、铁、金、银，铜铁诸器皆精好，善织毛锦。13世纪初，随着蒙古对外战争的胜利，使蒙古统治阶级把大批被俘的异族工匠驱赶到蒙古，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蒙古的工匠逐渐被异族工匠所取代，蒙古人主要从事家庭手工业，主要对畜产品进行加工。家庭手工业包括肉食品加工、奶食品加工、皮革加工、毛线加工及运输车辆、马鞍等的制作。蒙古人讲究饮食质量，不讲究数量，奶食品加工是妇女的劳动之一。她们对奶进行细加工，制作出奶油、奶酪、奶豆腐、奶皮、奶酒等高质量的多种饮品和食品。忽必烈建立元朝后，随着蒙古政治中心的转移，蒙古地区随之也失去了帝国的经济地位。自17世纪起，随着汉族工匠的进入，在呼和浩特、多伦诺尔、科布多、大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市）等地，都有了蒙古族手工业者。他们从事铁、木器制作及榨油、酿酒、加工皮革、制毡、制作佛像等手工业生产。察哈尔地区制作的毛毡成为清朝宫廷的装饰品。多伦诺尔的首饰、法器制作以做工精细著名。清乾隆前，准格尔的手工业之发展，远远超过了东蒙古，先后建立了呢绒、纺纱织布、皮革、造纸、印刷、兵器制造、冶炼等手工业作坊。乌鲁特鄂托克是策旺阿剌布坦汗设置的专门从事采矿和冶铁、铝、铜，提炼硝石、硫磺和铸造兵器的鄂托克，他们自己制造大炮和枪支子弹。阿尔塔沁鄂托克专门从事绘塑佛像、雕刻、制作金银首饰等工艺品。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商品的输入，蒙古族的手工业趋向衰落，手工业品的需求多依赖于市场，只有一部分生活必需品在家庭制作，少数大寺庙有绘塑佛像的画匠及金银匠。至20世纪40年代时，作为蒙古族的民族工业已不复存在，只保存下来畜产品加工的家庭手工业。

蒙古人的商业意识淡薄，在古代，畏吾儿和中亚商人垄断了蒙古贸易，在明代以互市方法与内地进行交易，无专门商人。鸦片战争以前，汉族、回族的小商小贩限期入蒙古地区经商，与蒙古人进行易货贸易；自鸦片战争以后，蒙古地区的商业被资本主义国家的代理商、旅蒙商所垄断。只有个别大寺庙进行商业活动，也有个别王公与汉商合股经商。牧民利用闲暇时间从事驼运业。阿拉善、乌珠穆沁等产盐区的蒙古人主要以驼运盐为主。蒙古牧民每年走一次“阿延”，有组织有领导地在城镇进行易货贸易。

蒙古的金融业有悠久的历史。1236年，窝阔台汗“诏印造交钞行之”。1253年蒙哥汗“又立交钞提举司，印钞以佐经用之”。鲁布鲁克在蒙古曾见过印有蒙哥汗印的纸币。元代，纸币成为全国范围通用的货币，并通过元代的国际交往影响了世界许多国家。北元时期，蒙古金融业衰退，蒙古地区的商业主要是易货贸易，几乎没有金钱交易。1873年发行库伦大仓钞票，约同一时期，喀尔喀赛音诺彦汗部的庆苏斯克图诺门汗忽图克图发行大仓贴子，分1元、10元两种，至1918年共印五次。20世纪30年代末，在内蒙古发行了100元、10元、5元、1元的钞票和5角、1角、5分、1分铸钱，通行于内蒙古西部地区。但在牧民中以羊作为货币价值的习惯长期存在。

蒙古地区，自古以来是诸游牧部落的活动场所。夏商以来，大大小小的部族和部落出没在这块广阔的草原地带。蒙古高原各部族和部落的兴衰、更替的历史，直到13世纪初蒙古族的形成才告结束，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民族。蒙古民族的形成，是自古以来活动在蒙古地区的诸部族和部落的大集成。蒙古民族在她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北方民族的文化。根据考古发掘与汉籍中记载的有关鲜卑人风俗习惯和语言，都证明与蒙古人有共同性，成吉思汗的女祖先阿兰豁阿《折箭训子》的故事来源于鲜卑人的一支吐谷浑。《蒙古秘史》上记载的古代蒙古人用热敷、放血方法治病也来源于东胡人的一支乌桓人，古代蒙古人烧羊肩胛骨卜的习俗来源于契丹人。蒙古语中保留了许多古匈奴语。蒙古的左、右翼的划分和十进制的组织形式

也来源于匈奴。蒙古部原为狩猎部落，后来他们又经营游牧业经济，继承了古代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成为“马背文化”的继承者，并丰富和发展了它。所以，蒙古族的历史文化，是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的大集成。13世纪初，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进行了半个世纪的对外战争，建立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蒙古大帝国。蒙古大帝国的建立不仅极大地方便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而且对蒙古族接收各民族的先进文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汉文化、阿拉伯文化，乃至欧洲文化，对蒙古民族的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自元朝以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使中国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密切。蒙古民族的文化影响了汉、维、藏、满等多民族的文化，同时，汉、维、藏、满等民族的文化也影响了蒙古民族的文化。经过继承、发展、吸收等历史过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蒙古民族传统文化。蒙古族文化的特点：第一是开放性。因为单纯的游牧文化所提供的精神财富，不能充分地满足人们对精神财富的需求。所以，促使蒙古民族在文化上成为一个不保守的开放性的民族，善于接受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并将其融合到本民族的文化中去。第二是刚毅性。游牧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顺应自然而存在。所以，蒙古民族的文化有探索自然规律、顺应自然、保护环境、图谋生存的顽强性和宏伟气魄。第三是崇德性。蒙古民族继承和发扬了古代北方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即讲公共道德、讲礼仪、讲信誉，真诚朴实。

蒙古民族在一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在人类历史上谱写出了一部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结束了蒙古高原数千年的不稳定局面，缔结了稳定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民族，使蒙古民族成为古代北方民族历史文化的继承者，成为“马背文化”的典型代表。如果把人类文化划分为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城市文化的话，蒙古民族则是人类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游牧文化（马背文化）的代表者，在人类历史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13世纪时，蒙古族是世纪的主人，她改变了当时世界的政治格局。蒙古人的西征，沟通了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交通，使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空前地频繁起来。蒙古人开辟东西交通的功劳不亚于哥伦布西航美洲所起的作用。哥伦布西航美洲，发现了新大陆；蒙古人的西征，开辟了东西方的交通。美洲的发现，使欧洲人有了新的财富和奴隶市场。蒙古人开辟东西方交通，使中国的三大发明传入欧洲，对欧洲各国未来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法国史学家莱弥萨说：蒙古人的西征，“此交通乃将中古之黑云，一扫而净。屠杀之祸虽惨，殊可以警奋数世纪来衰颓之人心，而为今日全欧复兴之代价也”。

蒙古民族又是中国版图的奠定者。忽必烈建立元朝，结束了自唐末以来四百余年的割据局面，建立了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为中国版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自清朝统治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蒙古民族受国内封建统治阶级和大汉族主义的反动统治及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使曾在历史上活跃一时的一个民族，被人类近代文明所抛弃，成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弱小民族。所以，蒙古历史上的很多谜需要解开。

18世纪，欧洲出现启蒙运动，为蒙古学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蒙古地区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争夺的一个重要目标。帝国主义为了实现侵略的目的，从历史到现状，从语言文字到风俗习惯都要研究。

蒙古建立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帝国，统治俄罗斯达240年，统治伊朗和阿拉伯达130年，匈牙利等欧洲国家曾遭受蒙古的侵略，法国、意大利、德国等曾与蒙古发生过关系。蒙古的统治和她的政治、军事活动成为这些国家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热心于研究欧、亚诸国史的人都会遇到蒙古史的问题。

总之，蒙古民族所走过的历史历程，她的政治制度、军事活动及经济、文化生活有着极其丰富的研究内容。蒙古民族的独特的经济、文化生活和特殊的地理环境及历史地位使她成为人类文明史中的一个典型和影响世界发展的民族。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从18世纪开始在世界上出现了专门研究蒙古的一门学科蒙古学。蒙古学

是专门研究蒙古的历史、语言文字、文学、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军事等的综合性学科。

沙俄、匈牙利、德国、法国等国家的蒙古学研究开始于18世纪后半叶，意大利、英国等国家的蒙古学研究开始于19世纪，日本的蒙古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蒙古学研究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学科。据不完全统计，现在研究蒙古学的国家和地区有50余个。

欧洲学者研究蒙古学侧重于语言学、历史学和文学。他们主要利用以下几个方面的史料：第一类是蒙古史专著。主要有：1. 拉施特主编的《史集》（1310—1311年完成）。拉施特是蒙古伊儿汗国的御医，合赞汗时曾任宰相。1310年，合赞汗命令他主持撰写一部蒙古史。他按合赞汗的旨令组织蒙古孛罗丞相等人撰写一部蒙古史，除利用汗斡耳朵金柜里保存的《阿拉坦·帖布特儿》（金册）外，又进行调查访问。《史集》的史料是可信的。2. 《世界征服者史》，作者志费尼，波斯人。1252年随其父亲撒希卜底万（窝阔台汗任命的呼罗珊地区财政部长），入朝觐见蒙哥汗。1252年5月至1253年9月居住在哈刺和林。1259年任报达（今巴格达）总督，管理阿拉伯哈里发（黑衣大食国）管辖的地区。他撰写此书，始于1252年，1259年结束。志费尼的很多材料，是他在旅途中所搜集到的，其中包括社会上流传的传说，对成吉思汗的军事活动记载尤为详细。3. 《伊儿汗史记》，作者瓦萨甫，波斯人。内容包括1257—1327年的蒙古史，是《世界征服者史》的续编。4. 《突厥世系考》，作者阿卜尔嘎齐（1605—1664），系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后裔，是花剌子模汗。该书的前半部主要参考拉施特的《史集》，后半部根据世所难得的公文书牍而成，用了土耳其文字。志费尼、拉施特、阿卜尔嘎齐的书，是西方蒙古学之三大源泉。第二类是游记。主要有三个：1. 谱兰诺·迦尔宾的《蒙古史》。作者奉罗马教皇和法国国王旨令出使蒙古，于1246年到达蒙古首都哈刺和林。《蒙古史》是作者向罗马教皇汇报的有关蒙古的生活、政治、军事情报。2. 鲁布鲁克的《东游记》。作者奉法国国王之旨令，出使蒙古，1254年到达哈刺和林。他曾觐见蒙古的蒙哥汗，在蒙古住了一年多时间。回国后撰写该书，书中对蒙古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报道。3. 《马可波罗游记》。作者马可波罗是意大利威尼斯商人的儿子，1271年来到蒙古，在中国居住17年。曾任元朝枢密院副史，代表元朝出使印度等国。回国后正遇威尼斯与热内亚之战，他被征兵入伍，在战场被热内亚所俘入狱。狱中口述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由同一监号的人记录。第三类是蒙古文史料。蒙古文史料是东、西方学者研究蒙古学的主要史料来源之一。自18世纪末开始，欧洲学者开始搜集蒙古文史料。1778—1790年，德国人芬雅施收集蒙古文抄本33部，1823年茨维克从卡梅克收集70部托忒文抄本。这103部蒙古文抄本，是德国人最早收藏的蒙古文抄本。18世纪后半叶开始，俄国人也开始收集、翻译蒙古文抄本。1776年，帕拉斯德把《蒙古·卫拉特法典》译成俄文。日本学者收集、翻译、研究蒙古文史料，开始于20世纪初，那珂通世（1851—1908）是日本蒙古学的初创人。他从1901年开始出版《蒙古秘史》的研究工作，1907年完成了翻译，1908年出版《蒙古秘史》的日译注释本《成吉思汗实录》。截至目前，蒙古的主要经典作品都被译成英、俄、法、德、日、匈牙利等多种文字。第四类是调查材料。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外国组织旅行团、考古队、调查团和派遣传教士来蒙古地方进行实地调查，收集了大量的考古、历史、语言、文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经济、政治、军事等诸方面的材料，最早到蒙古地区进行实地考察的是俄国。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共进行33次实地考察。帕列瓦尔斯基的《蒙古和唐古特》（1875—1876年出版）、波斯德涅也夫的《蒙古和蒙古人》等书都是经实地考察写成的蒙古学巨著。田清波的《鄂尔多斯方言辞典》是研究蒙古语的名著。法国传教士古伯察的《鞑靼西藏旅行记》（1851年出版）是当时蒙古情况的记录。

1921年蒙古国独立后，专门成立蒙古学研究机构，从事蒙古学研究。现在已经成为研究蒙古学的主要国家之一。国际蒙古学学者联合会总部设在蒙古国乌兰巴托。蒙古国蒙古学的研究已引起国际蒙古学界的注目。

外国研究蒙古学，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有那珂通世（日本）、达木丁苏荣（蒙古）、符拉基

米尔佐夫(俄国)、利盖提(匈牙利)、海涅士(德国)、伯希和、多桑(法国)、霍渥尔斯(英国)等许许多多著名的蒙古学家。出版过《多桑蒙古史》、《蒙古社会制度史》等许许多多的名著。

中国研究蒙古学始于元代,而且是从蒙古语言学的研究开始的。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把蒙古语作为“国语”。因此,语言的规范化已成为迫切要求。1260年忽必烈旨令西藏喇嘛八思巴创制蒙古字。八思巴以藏文为基础用10年时间创制了蒙古方块字。1269年忽必烈颁布诏书,规定蒙古方块字为全国通用的官方文字。蒙古方块字的创制,是蒙古语言研究的结晶。但方块字书写不便,在蒙古人中没有广泛使用,未能取替原来使用的畏吾儿文。1305—1311年,语言学家捌思吉斡节尔以畏吾儿字母为基础编著《蒙文启蒙》一书,正确地揭示了蒙古语的特点、语法和拼写法,改进了一些畏吾儿字母的写法,增加了个别字母,确定了“回鹘式蒙古文”,为现代蒙古文的语法、读音、书写法奠定了基础。明朝为了与北元交往,把1368—1418年间的《蒙古秘史》音译为汉文,这是中国汉族学者研究蒙古语言规律、蒙古字的读音、书面语与口语的特点(差异)的结晶。汉译者为了准确表达蒙古语的发音,同时为使词义与字义尽量达到接近,创制了许多古怪汉字。明初,火源洁编著第一部蒙、汉语对照词典《华夷译语》。自16世纪末,藏传佛教的一支黄教传入蒙古后,蒙古族学者在元代翻译的基础上,继续翻译藏文经卷。为了准确表达梵文、藏文名词,喀喇沁部学者阿尤喜·固什创制蒙古文阿里伽里字,使蒙古文能准确表达外来借词的读音。

16世纪末到17世纪70年代,是蒙古族学者研究蒙古史非常活跃的时期。这时,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万世一统的统治发生危机,已临灭亡。蒙古族学者站在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正统观立场上研究蒙古的历史,他们利用蒙文史料记载、民间口头传说,以佛教的世界观为理论指导,撰写蒙古的历史,宣扬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万世一统的正统观,论证其皇位的不可动摇性。这时期的主要历史著作有《黄金史纲》、罗布桑丹津主编的《黄金史》、佚名作者的《大黄册》、善巴的《阿撒拉嘎齐史》、萨囊彻辰的《蒙古源流》等。

清代是中国蒙古学的发展时期,康熙时蒙古族学者拉希等人于1708—1717年编著了蒙古文《二十一卷本辞典》,这是最早的一部蒙古语解释辞典。乾隆时期,乌珠穆沁的官布扎布、乌拉特的毕力棍达赛编著了《阿必忠乃》辞典,这是一部蒙、藏对照的蒙古文百科全书,对蒙古语名词术语的统一和规范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8世纪,乌珠穆沁的丹津达格巴著有《斡黑吐日桂·因·玛尼》,是根据捌思吉斡节尔的《蒙文启蒙》写成的蒙古语法专著。书中详细讲述了蒙文阳性、阴性、中性字母的拼写法及蒙文属格的使用方法。同一时期乌拉特的毕力棍达赛也著有《简明语法》一书。清代蒙古族学者编著的《三合便览》《四体合璧文鉴》两部工具书是大型蒙、满、汉文及蒙、满、汉、藏对照辞典。

清代,蒙古族学者对本民族历史的研究在蒙古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自18世纪至19世纪末,蒙古族历史学家撰写了二百余种蒙古史著作。其中主要的有官布扎布的《恒河之流》、达日玛·固什的《金轮千辐》、拉希彭苏克的《水晶数珠》、金巴道尔吉的《水晶鉴》、巴托尔·斡巴什·土门的《四卫喇特史》、青海和硕特部人松巴堪布的《蒙古史》、喀尔喀噶尔丹的《宝贝数珠》等。

1774年,巴林部人拉希彭苏克撰写的《水晶数珠》中首次采用史的批判,对汉籍中记载的有关蒙古史的不客观记载进行评议,提出自己的见解。1725年官布扎布撰写的《恒河之流》,1739年达日玛·固什撰写的《金轮千辐》,对北元时期形成的各部的源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和论述。

在清代,中国汉族学者研究元史学颇有成就。如,1. 钱大昕(1728—1804)推许《蒙古秘史》和何秋涛(1824—1862)校勘《圣武亲征录》,被视为元史学之两大纪念。钱氏从《永乐大

典》中发现十五卷本《蒙古秘史》并公布于众，使元史研究有了新的史料；何氏校勘元代蒙文史书的汉译本《圣武亲征录》，使更多的元史学家能够利用该书。2. 利用外文史料补充汉文史料之不足。中国元史学家，第一个接触外文史料的是洪钧（1839—1893）。他出使俄国期间，正值波斯人拉施特《史集》和英国人霍渥尔斯的《蒙古史》英文版出版。他请人翻译，著《元史译文正补》，使中国人研究元史扩大了视野。3. 修补《元史》。钱大昕是清代研究元史的第一代名人。他立志修改《元史》，但未果。他在元史方面的著作有《补元史氏族表》（3卷）、《补元史艺文志》（4卷）、《元史拾遗》等。魏源（1794—1857）是清代研究元史的第二代名人，著有《元史新编》（95卷）。屠寄也是清代研究元史的名人之一。他认为《元史》并不能概括全部蒙古史，金帐汗国、伊儿汗国、察哈台汗国的历史并没有包括。他立志撰写一部概括整个蒙古的蒙古史，著有《蒙兀儿史记》，补充了《元史》所没有的内容。柯劭忞（1850—1933）的《新元史》（共257卷）是清代元史研究成果的大集成。他吸收了钱大昕、魏源、何秋涛、李文田、洪钧、屠寄的研究成果。1922年当时的民国政府将其列入正史，并公开出版。4. 考据《蒙古秘史》。清代有许多学者考注《蒙古秘史》，其中李文田（1834—1895）最为著名。他利用正史11种、宋代史料7种、金人著述1种、元代史料7种、明代史料10种、清代史料17种、元人碑碣文字11种，校注《蒙古秘史》，写出《元朝秘史注》（15卷），并于1898年发表。这是清代考据学的一大成就。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是研究蒙古各部的社会历史和地理方位的专著。

民国成立后，中国的蒙古学研究仍延续清代的传统，侧重研究语言学及历史学。在语言文字研究方面，20世纪30年代成立了蒙藏语文研究会，有蒙古语文研究专刊（蒙汉文）。1917年喀喇沁的海山贝子在北京出版《五方元音》，1934年喀喇沁右旗蒙文书社油印发行乌云宣的《蒙文接字法》。20世纪40年代，《增编简易蒙文文法》问世，1912年王文兵等人编著出版《蒙古大辞典》（蒙汉文）。1926年北京蒙文书社出版发行特莫格图的《蒙文分类词典》，1943年科尔沁和兴格的《蒙文指要》问世。这些作品是中国蒙古语文学家多年研究蒙古语的成果，对蒙古语文的普及和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史学研究方面，一方面继承了清代元史学的传统，另一方面吸收了西方学者的史学方法。这个时间王国维的校注《蒙古史料四种》和冯承钧的致力于翻译介绍西方的蒙古史料的研究论著，为中国蒙古史研究工作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为中国蒙古史工作者提供了比洪钧《元史译文正补》更丰富的史料。20世纪40年代阿拉坦敖其尔编著的《成吉思汗战书》（蒙文）问世。作者吸收西方的史学方法，利用蒙、汉文及外文史料，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成吉思汗一生的战斗历程。

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蒙古史的研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即1940年左右在延安成立了民族问题研究会、蒙古文化促进会、蒙古文化陈列馆、成吉思汗纪念堂等，有组织有领导地研究蒙古问题。延安民族学院还开设蒙古语文课。在延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研究蒙古的历史和社会问题，编著了《蒙古民族问题》（民族问题研究会编）一书，探索了蒙古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及民族关系，揭露和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对蒙古民族的侵略压迫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汉族主义。该书是中国蒙古史学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第一部蒙古史专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光照耀耀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全面开展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的研究工作，在中国科学院设立民族研究所，有研究蒙古语文、历史的专业人员。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了蒙古语文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在内蒙古大学设有蒙古语文研究室、蒙古史研究室，配备专业人员专门从事蒙古语文、历史研究。南京大学有以韩儒林教授为首、中央民族大学有以翁独健教授为首、西北民族大学有以再谢善为首研究蒙古史和蒙古语文的专职人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领导中国少数民族五套丛书的编写工作，其中包括蒙古族的五套丛书。20世纪60年代开始着手编写《蒙古族简史》《蒙古族简志》《蒙古族自治地方概

况》《蒙古族语言简志》《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这五套丛书。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组织有领导地全面开展蒙古学研究的举措。但因1957年的“左”倾思想路线严重干扰了这一工作的顺利进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编写工作完全停止,而且材料被损坏。

20世纪50年代,先后出版了陶克涛编著的《内蒙古发展概述》和余元庵编著的《内蒙古历史概要》两部蒙古史专著。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史学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第一批蒙古史专著。在蒙古文学研究方面,内蒙古语文研究所深入到中国蒙古族聚居的农村牧区,收集大量的民间口头文学,并整理编印成册,作为内部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给蒙古学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在党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指导下,特别是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蒙古学研究有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除原有的民族研究所外,又设置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其中蒙古族文学研究占有重要地位。1979年2月建立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设历史、语言、文学、牧区经济研究所和蒙古族哲学社会思想史研究室。青海、新疆等省区社会科学院也设有蒙古学研究的专门机构,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亦有研究蒙古学的专职科研人员。高等院校是研究蒙古学的主要阵地之一。内蒙古大学设有蒙古学研究院,专门从事蒙古历史、语言、文学的研究工作;内蒙古师范大学也设有蒙古语文、历史、蒙古族哲学社会思想史研究所和蒙古族畜牧经济研究室,蒙古族科技史是该校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所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的元史研究颇有名望。高等院校又是培养蒙古学教学和研究人才的基地,近十年来培养了一批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年轻蒙古学教学和研究人才。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设有格斯尔办公室。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成立了有关蒙古学的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学会、研究会。全国性的学会有中国蒙古史学会、中国蒙古语学会、中国蒙古文学学会、江格尔研究会、元史学会等。内蒙古自治区有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研究会、蒙古族经济史研究会等。这些学会团结、组织蒙古学研究人员,开展学术活动,为推动蒙古学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

蒙古学研究领域不断扩展。近十年来开辟了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经济、军事、法律、教育、宗教、蒙古文历史文献、科技、美术、文艺、体育、风俗习惯、音乐、蒙医史等新学科。中国的蒙古学研究已经涵盖了蒙古族的社会经济和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

在蒙古学研究中,资料搜集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内蒙古蒙古语文研究所有组织、有目的地深入到农村和牧区搜集蒙古文资料。已故的莫日根巴特尔先生作出了突出贡献。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收集到数千册蒙古文古籍,其中有的是孤本和珍本。现在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为全国蒙文藏书最多的图书馆。目前,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和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已成为蒙古学史料中心之一,为研究工作者提供必要史料,是推动蒙古学发展的首要条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校注出版了《蒙古秘史》《白史》《元史》《蒙古源流》《黄金史纲》(蒙、汉文)《罗·黄金史》《蒙古·卫拉特法典》《金轮千辐》《水晶鉴》《水晶数珠》《蒙古孛儿只斤氏族谱》《青史演义》《江格尔》《格斯尔》《卫拉特史料集》《呼和浩特市档案史料汇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还有那木云、阿萨拉图等蒙古族学者翻译出版的《蒙古游牧记》《蒙鞑备录》《黑鞑事略》《长春真人西游记》和余大钧等学者翻译出版的拉施特的《史集》,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普兰诺·迦尔宾的《蒙古史》(蒙汉文),鲁布鲁克的《东游记》(蒙汉文),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蒙古社会制度史》,田山茂的《清代蒙古社会制度》,田清波的《明代蒙古史论集》,兹拉特金的《准格尔汗国史》等(译成汉文或蒙文);即将出版的有包文汉校勘的《藩部要略》等蒙、汉文史料。这些史料的翻译和出版对蒙古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还有蒙古学学术刊物近20种。

蒙古史研究方面,中国学者打破了侧重研究古代史或元史的传统,把研究范围扩展到近代和现代。内蒙古大学设有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出版了郝维民主编的《内蒙古近代简史》《内蒙

古自治区史》等专著。内蒙古大学的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历史系都招收内蒙古近代和现代史硕士研究生。史学研究涉猎蒙古史各个方面的内容,如族源、社会性质、明和蒙古的关系、清对蒙古统治的评价、历史人物评价、蒙古的历史地位、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近代以来蒙古人民的反帝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斗争和“独立”“自治”运动等诸问题。金锋编辑出版的《蒙古史论文选辑》(15卷),元史学会编的《元史论丛》,中国蒙古史学会编辑的四次会议论文集,反映了中国学者研究蒙古史的学术水平。亦邻真的《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源》一文,对多年争论的蒙古族源问题进行探讨,得出了有益的见解。除专题研究外,通史和断代史研究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五套丛书的《蒙古族简史》已出版,翁独健先生主持了这一工作。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著出版了三卷本《蒙古族通史》(蒙汉文)。韩儒林主编的《元朝史》继承了中国元史研究的传统,并以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为指导,对元朝的历史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李干的《元朝社会经济史稿》,李志安的《元代的分封制度研究》是元代史的专题研究专著。白翠琴的《瓦剌史》是研究明代卫拉特的专著。卫拉特史的研究近十年来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内蒙古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牵头,先后召开三次全国性的卫拉特史学术讨论会。马汝珩、马大正合著的《漂落异域的民族》,专门论述了17—18世纪土尔扈特蒙古的历史,波·少布的《黑龙江蒙古研究》是研究黑龙江地区蒙古族历史、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专著。即将出版的《中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百科全书·蒙古族卷》是概括蒙古学各领域的工具书。人物传记方面有赛熙亚乐的《成吉思汗史记》等。

蒙古语的研究也得到了广泛深入的开展。研究范围包括蒙古语言发展史,蒙古语词汇、语法、方言、土语、文字、辞典,蒙古族语言的关系等方面,发表了许多论著。发表的专著有清格尔泰、包祥、却金扎布合著的《现代蒙古语》,清格尔泰的《现代蒙古语语法》,哈斯额尔敦与那仁巴图合著的《蒙古语基础》,诺尔金编著的《蒙古文原理》等。此外,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都有论文集出版。方言研究方面,内蒙古大学蒙古语研究所已出版21辑文集。蒙古族族语言研究方面,照那斯图、道布等人根据20世纪50年代社会调查的语言材料,发表了蒙古、达斡尔、土族、东乡、保安、裕固语简介。在文字研究方面先后出版了《蒙古文字学》《蒙古文字简史》等。

文学研究也在广泛深入地开展。研究范围包括文学史,著名作家,当代文学的评论,古代文学、诗歌、民间文学等。文学史有《蒙古文学简史》《蒙古文学概况》《蒙古文学史》。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有那木吉拉舍旺的《蒙古古代文学研究论文选集》和希格陶克陶的《蒙古古代文学研究》等专著和文集。中国学者在研究蒙古族著名文学家尹湛纳希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成绩显著。收集整理出版尹湛纳希作品的同时,对他的生平、作品、文学思想、文艺技巧诸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额尔敦陶克陶、那木吉拉舍旺等人有重大贡献。在民间文学研究方面,收集整理出版了大量的民间口头文学。其中仅以《江格尔》《格斯尔》为例,以巴岱为组长的《江格尔》研究小组,搜集全新疆范围的江格尔故事,出版了九卷九十四章的《江格尔》和两卷本六十章的《江格尔》。仁沁道尔吉的《英雄史诗江格尔》专著,代表中国学者研究江格尔的学术水平。“格斯尔”研究列入了国家“六五”“七五”计划。内蒙古民族事务委员会格斯尔办公室收集整理出版了20余种书面和民间口头流传的《格斯尔》。

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来说,这是蒙古学领域里的新的研究课题。目前,研究机构及专职研究人员已粗具规模。蒙和巴图同志最早带头研究蒙古族哲学史,并组织蒙古族哲学史研究会,促进了蒙古族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在资料搜集整理方面,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族哲学史研究室出版五本《蒙古族哲学史资料选编》(蒙文)、两本《蒙古族哲学史论文集》(汉文)。内蒙古师范大学政治经济系招收蒙古族哲学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研究成果显著。格·孟和的《蒙古哲学研究》及其他同志的《蒙古哲学思想史》《蒙古族

哲学史》等，都是蒙古族哲学史研究的新成果。

巴音图同志领导的蒙古族军事史的研究也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内蒙古蒙古族古代军事思想史研究会做了大量的工作，撰写了《蒙古古代战争史》，编辑出版了三本《蒙古族军事研究论文集》。

蒙古族经济史是蒙古学研究领域里的新兴学科。高万宝扎布同志领导的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经济史研究会；团结、组织广大学者开展蒙古族经济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在这方面陈献国同志做了大量工作。蒙古族经济史研究会召开过几次全区性的经济史学术讨论会，出版了十余种学术论文、专著和译著。内蒙古师范大学设有畜牧经济研究室。

蒙文文献学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设有蒙文文献研究室，专门研究蒙文历史文献。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留金锁的《13—17世纪蒙古历史编纂学》一书和乔吉的《蒙文文献版本研究》专题论文，对蒙文历史文献的内容及版本学进行了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校注出版了十余种历史文献。除不同版本的校勘外，还做了大量的历史学、语言学、文字学、宗教学的注释。已故的戈瓦、额尔登泰、乌云达赉等人及珠荣嘎、纳古单夫、乔吉等人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的校注得到国际上的有关学者的注目。

法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见效于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最早研究蒙古法的是潘世宪先生，他著有《蒙古法制研究》一书（内部印发）。20世纪80年代以后奇格先生专门从事蒙古法的研究，发表了蒙古法的系列文章。

蒙古族教育史的研究也是近十年才开始的，发表了很多专题论文。娜琳的《论述贡桑诺尔布创办蒙古新式学校》的专题论文，是肃清“左”的思想，正确评价蒙古族近代教育的有效尝试。由娜琳负责撰写的《蒙古族教育史》已列入自治区研究课题。

从事蒙古族科技史研究的有李迪、吉格木德等人。他们为蒙古科技史的研究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吉格木德的《蒙医史》、巴拉吉尼玛的《蒙古族科学家》等是研究蒙古族科技史的专著。李迪主编的少数民族科技史论文集（17集），反映了中国研究蒙古族科技史的学术水平。

此外，文化艺术、体育的研究也是蒙古学新兴学科。阿木尔巴图在蒙古族美术史的研究方面颇有成绩，尤其对古代北方民族与蒙古族美术的渊源关系方面研究深入，对蒙古族美术的渊源问题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见解。

中国蒙古学界与国际蒙古学界发生广泛接触，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20世纪50年代，只有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达木丁苏荣、李·林沁、沙·纳楚克道尔吉，苏联的德累科夫，匈牙利的哈拉道尔吉等少数学者来中国进行学术访问。20世纪60年代以后与外界的联系基本断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蒙古学界与国际蒙古学界开始进行广泛接触。蒙古、朝鲜、韩国、日本、俄罗斯、匈牙利、德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美国等国的学者陆续来中国进行学术访问，中国也派学者去蒙古、日本、俄罗斯、德国、美国进行学术访问。中国蒙古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提高。有关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如国际蒙古学者联合会第五、六届会议，中亚文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蒙古秘史》成书7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日本外国语大学的清代历史文献国际学术讨论会，印度召开的蒙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都邀请中国学者参加。中国也召开过数次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如中国蒙古史学会召开了蒙古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内蒙古大学召开了两次蒙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内蒙古师范大学召开了《蒙古秘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格斯尔办公室召开了《格斯尔》国际学术讨论会等。蒙古学的国际交流促进了中国蒙古学的发展。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引起国际蒙古学界的注目。

中国蒙古学的研究有悠久的历史。前人在蒙古学研究特别是蒙古史和蒙古语文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我们今天的蒙古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因历史的种种原因，中国的蒙古学研究